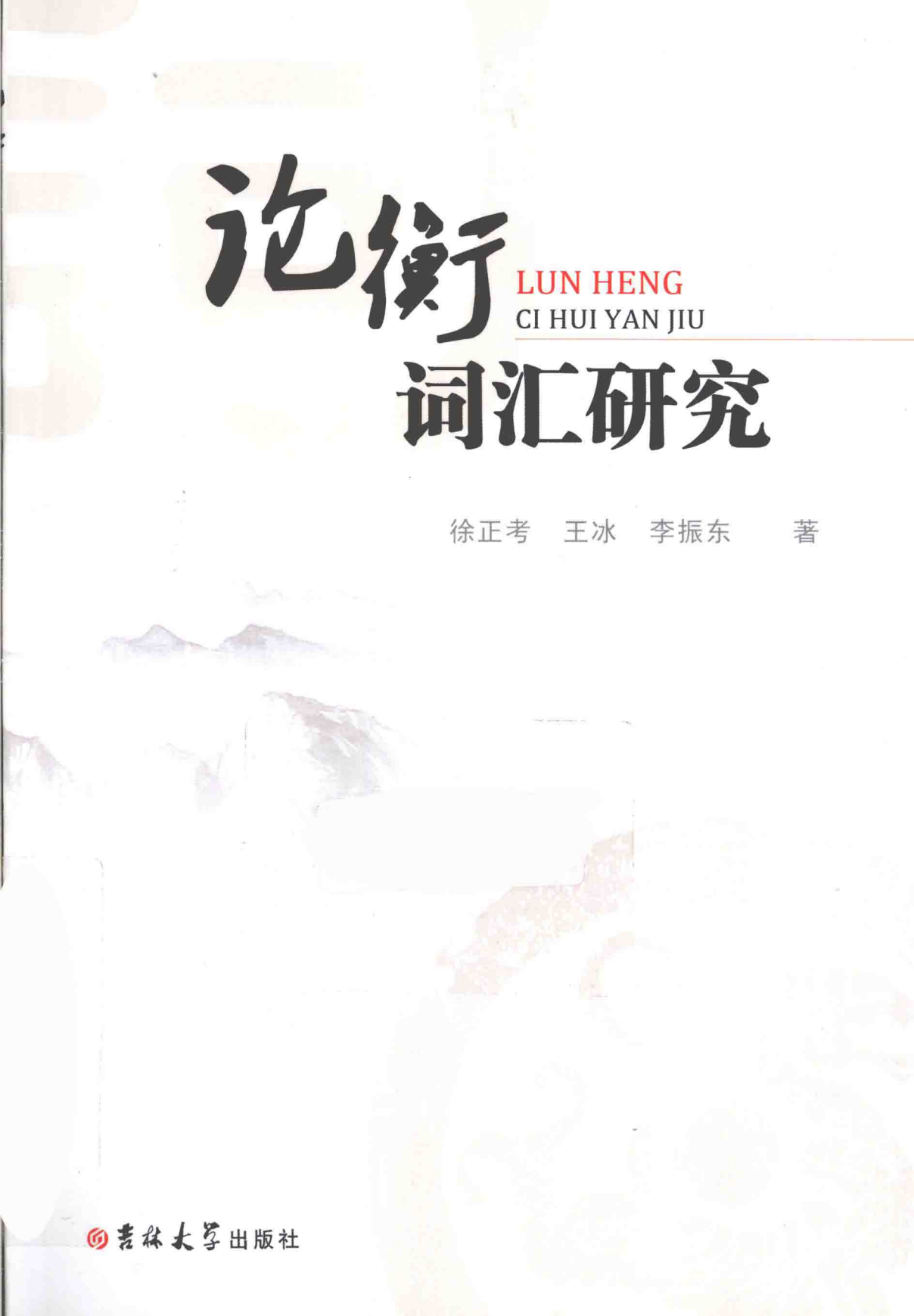




论衡

LUN HENG
CI HUI YAN JIU

词汇研究

徐正考 王冰 李振东 著

LUN HENG
CI HUI YAN JIU

徐正考 王冰 李振东 著



吉林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衡》词汇研究 / 徐正考, 王冰, 李振东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677 - 1450 - 2

I. ①论… II. ①徐… ②王… ③李… III. ①《论衡》
—词汇—研究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413 号

书 名: 《论衡》词汇研究

作 者: 徐正考 王冰 李振东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仲怀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4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1450 - 2

封面设计: 林雪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2014 年 3 月 第 1 版

2014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一、《论衡》词汇研究现状	1
二、《论衡》及其语料价值	2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价值	5
第一章 《论衡》同义词研究	6
一、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6
二、同义词的界定	12
三、确定词的同义关系的方法	15
四、《论衡》同义词概貌和特点	27
五、《论衡》中字序对换的同义词	34
六、《论衡》同义词的辨析	39
七、《论衡》同义词研究的意义	51
八、同义词产生原因试探	53
第二章 《论衡》反义词研究	57
一、古汉语反义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7
二、《论衡》反义词研究的基本问题	61
三、《论衡》反义词分析	66
四、历时比较	72
五、《论衡》反义词研究的意义	75

第三章 《论衡》复音词研究	80
一、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80
二、《论衡》中的单纯词	89
三、《论衡》中的复合词	98
第四章 《论衡》中的新词新义	132
一、《论衡》新词新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132
二、《论衡》中的新词新义	132
结 语	170
一、关于表述方法问题	170
二、关于“穷尽”问题	171
三、关于归纳标准的宽严问题	172
参 考 文 献	175
一、著作	175
二、论文	180
附录一 《论衡》同义词表	193
附录二 《论衡》同素异序同义词表	206
附录三 《论衡》反义词表	207
附录四 《论衡》复音词表	211
后 记	216

绪 论

一、《论衡》词汇研究现状

两汉汉语是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两汉汉语的研究对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只是学术界在两汉汉语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这一时期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称。就词汇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的两汉汉语词汇研究成果问世。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收到扎实、可靠的效果；而以专书词汇研究为基础的断代研究才能深入、确切。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选取《论衡》词汇作为研究对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论衡》词汇综合研究成果问世，但有的学者对其中的个别问题做过一些研究，主要有：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载《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论衡〉中联合式双音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变化》（《中国语文》1984年6期）、祝敏彻《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载《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胡敕瑞《〈论衡〉的新词新义初探》（四川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方文一《〈论衡〉中同义词运用的特点》（《汕头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范崇峰《从洛阳方言角度释〈论衡〉词语三则》（《中国语文》2004年第2期）、曹之《〈论衡〉“刻写”释义辨析》（《出版史料》2010年第4期）、刘曦《〈论衡〉核心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另外，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见“参考文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述涉及到《论衡》词汇问题（举例性质），这些著述包括通论性研究成果（如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泛时研究成果（如王凤阳《古辞辨》）、断代研究成果（如向熹《简明汉语史》）、专书研究成果（如周日健、王小莘《〈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词汇发展演变类成果（如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论衡》词汇问题作了探讨，大大有助于《论衡》词汇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论

衡》词汇全面、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二是在一些理论问题（如同义词判定标准、复音词确定方法、反义关系确立原则等）上缺乏令人信服而又行之有效的阐述。

二、《论衡》及其语料价值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具有独特魅力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较高语料价值的文献。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年—104年）。王充所处的时代，图谶符命、天人感应之说盛行，作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王充深疾此风，耗时三十年，写出了这部旨在“疾虚妄”、“求实诚”的哲学力作。

《论衡》现存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只有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流传到现在的本子以明嘉靖通津草堂本为最佳，而通行的校注本当推刘盼遂的《论衡集解》与黄晖的《论衡校释》，尤以黄晖《论衡校释》为精。本研究即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1990年版）为取材对象，有关统计主要依据程湘清等所编《论衡索引》（中华书局，1994年版）。

研究汉语的发展史，首要的工作是进行断代研究，而断代研究的基础工作是进行专书、专题研究，这已经成为有见地的学者们的共识，而且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指导性原则。而选取什么样的专书，又是能否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我们选取专书的目的是将专书作为研究汉语史的语料，因此，是否具有语料价值就成为我们选取专书所依据的标准。而《论衡》是否具有语料价值，又是本研究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

选用的语料是否合适，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有语料价值的专书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成书年代确定。从汉语史角度选取专书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弄清专书的语言面貌和语言特点，了解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语言面貌和特点，所以专书成书年代是否确定，便成为决定其语料价值的关键因素。据《论衡·自纪篇》和《后汉书》本传，王充生于东汉光武建武三年，即公元

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胡适认为“大概他死时在西历一百年左右”^①；而据黄晖考证，该书的写作始于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封笔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凡30年^②。这些结论的得出主要依据《论衡·自纪篇》（下文凡引《论衡》均只列篇名）及《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信而有据。因此，《论衡》成书年代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能够反映或至少接近当时通行的口语；不但如此，今天还必须能够保持其本来面目。一般认为，先秦时期言文还是一致的，但从汉代开始，书面语便有了脱离口语的倾向。因此，汉代以后（包括汉代）的专书选取工作就要充分考虑其反映口语的程度。很显然，如果汉代以后的某部专书是模仿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而写成的，那就没有什么语料价值。王充所处的时代，很多文人（特别是汉赋作者）为文“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自纪篇》），一味仿古，崇尚华丽的文风，严重地脱离了口语。而王充深疾此风，力主使用口语、俗语，以使“书形露易观”（《自纪篇》）。在《自纪篇》中，他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获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著述应该“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并反问：“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针对时人所认为的“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读。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王充指出“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即认为古代经典难读，是时代和方言差异造成的，古贤圣为文也是“其文可晓”。王充在作《讥俗篇》、《节义篇》十二篇时，“直露其文，集（杂）以俗言”，作《论衡》时也必是如此。通过王充的自我表述，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论衡》能够反映当时的口语。但如果一部原本能够反映口语的专书，后来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做了较大的改动，那么，其语料价值也就大大地降低了。民国时期的黄晖在《论衡校释》的“自序”中考定该书“未经后人改编”，“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唯其如此，《论衡》到今天也还保持了它的本来面目。

第三，有较大的词汇容量。一部专书的词汇容量不管多大，都涵盖不了当时的所有词汇，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词汇容量越大，就越能反映当时的词汇面貌和特点，这也是常理。东汉王朝享祚195年，整个东汉时代的语料，

① 胡适《王充的论衡》，《现代学生》第一卷，转引自《论衡校释》附编四。

② 黄晖《论衡校释》附编二《王充年谱》。

约有三百万字。^①《论衡》成书那30年中出现的语料留存到现在者有多少,我们未做统计,估计也只有一百万字左右。而《论衡》全书约21万字,东汉前期的语料只有《汉书》的字数超过了它(《汉书》约50万字),但《汉书》反映口语的程度恐怕不如《论衡》高,而且《汉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这样说来,研究东汉前期的汉语,大概不会有比《论衡》更合适的语料了。

第四,内容涉及面广。如果一部专书的内容涉及面窄,它使用的词汇也必然范围狭窄,即使文字量大,也只是这范围狭窄的词汇的重复使用所致。如果涉及的内容广泛,它就会用到方方面面的词汇,其作为语料的价值也就必然大。《论衡》虽然是哲学著作,但并非纯粹形而上的哲学理论著作(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大部分哲学著作的共同特点),而是结合当时各方面的社会现实及历史阐发其哲学思想,内容涉及到当时及历史上诸如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天文、地理等,其词汇涵盖面自然也很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论衡》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处理《论衡》引文。《论衡》行文中经常出现引文,引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征引原文,这部分引文不应算作《论衡》的语言,因此不应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剔除。另一类是对原文作个别改动,其改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为了使之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如《论语·泰伯》“启予足”,《四讳篇》引作“开予足”,乃避景帝讳,这一种引文可以作为《论衡》语料使用。^②还有一种可能是王充记忆错误所致。《后汉书》本传言王充少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一生未发达,恐怕至死也不会有多少藏书,而《论衡》引书种类是很多的,所引之文至少有一部分当是凭记忆。这一方面说明王充天分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引文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必嫁是”,《死伪篇》引作“必嫁是妾”,可能就是记忆错误所致。对这一种引文要作不同的对待,如果《论衡》引文较原文更通俗、明晰,则可以作为当时的语料来看待(如上例);否则应剔除。如《淮南子·本经训》“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论衡》两处引用此文而字不同:《异虚篇》引

① 张能甫《东汉语料及同素异序的时代问题——对〈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的补说》,《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专书中的引文问题,可参方一新、王云路《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载《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柳士镇《〈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

此文“粟”作“谷”，《感虚篇》引此文作“粟”，而“苍”作“仓”。至于将前人作品中的句、段表达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这样的叙述语应视为王充的语言。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价值

本研究拟对《论衡》同义词、反义词、复音词、新词和新义进行专题研究。在对各专题进行研究时，首先进行理论方法上的探讨，主要是对已有理论方法的反思、相关判定标准的确立及有关词汇现象的产生机制（原因）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用系联法、归纳法、统计法等对《论衡》词汇现象进行穷尽的发掘，进而描写、分析，系统展示其词汇的真实面貌，以古今通观、前后观照的方法全方位探求《论衡》同义词、反义词、复音词及新词新义的特点。

该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揭示《论衡》词汇的面貌与特点为学术界提供一份研究《论衡》语言、汉代词汇乃至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参考，另一方面可以为词汇史、词汇学理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另外还有助于大型语文辞书的修订与编纂。

第一章 《论衡》同义词研究

一、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同义词”是现代语言学术语，不过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注意到这种语言现象，并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研究。但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初始阶段，属于前语言学时期（或者说是“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又是重要的，不管是从观念上还是从方法论上，对近六七十年语言学时期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都具有启迪作用。现就这两个时期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情况作一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语文学时期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

在先秦典籍中，我们时或可以看到一些文中自注现象，这种自注或出于文中人物之口，或作者自注，如：

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左传·文公三年》）

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諏，咨难为谋。”（《左传·襄公四年》）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战国策·秦策》）

书中自注的目的“当然并不是要对词义内容作出探索，而是借助词义的解释，作为正文不可剥离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以阐述某种思想意识、哲学观点、政治主张，表达某种是非褒贬、评价态度，论证某种事理关系。”^①但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自注至少涉及到以下问题：

第一，认识到了某些词之间存在同义关系；

第二，认识到了具有同义关系的某些词之间同中有异，并作了辨析；

第三，认识到了古今同义词问题；^②

① 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P164-165。

②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P6。

第四，认识到了方言同义词的存在。

这些认识在同义词研究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以进一步印证中国一切学术均源于先秦的论断的正确性。

当然，这些自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训释词义，不是对词之间的异同进行词义辨析，其认识是朦胧的，其方法是不自觉的，因此其工作也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其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

汉代，训诂学昌盛，同义词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尔雅》、《说文解字》、《方言》及经传注释。《尔雅》前三篇“大都是罗列汉以前的同义词，用一个较为通行的词加以解释。3篇共计625条，绝大多数是同义词组。”“许慎《说文解字》有175对互训的例子，即用甲字训释乙字，又用乙字训释甲字。它们绝大多数也是同义词。”^①宋永培先生通过对《说文解字》的训释格式的归纳，总结了许氏对词的同义关系及同义词群之间的相对关系的表述特点，^②对我们认识《说文》同义词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方言》广泛描述了当时不同方言之同义词的异同，高诱在《淮南子》注中还使用了“互文”这一术语，互文者具有同义关系。^③

汉代学者对同义词的研究，除了吸收、继承了先秦同义词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外，还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具有自觉性；

第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第三，利用特定的格式研究同义词，有了表述同义关系的术语。

同时，也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严格区分时代。汉代学者在研究分析词的同义关系时，基本上都是笼统地将先秦文献看作是一个平面的东西，未能按先秦的不同时代研究分析词的同义关系；

第二，同义关系的确定原则与方法比较粗疏。如《尔雅》前三篇中的所谓“同义词组”，有的词之间既非同义又非近义，只是具有某种联系。作者有时将同一汉字表示的两个词混同了，有时又将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混同了。^④

从汉代到明末，同义词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但基本上沿用了汉代人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P443。

② 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312-317。

③ 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载《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④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38。

的方法，其研究水平也并没有超过汉代学者。

清代，训诂学大盛，同义词的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研究不但更精细了，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这一时期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可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代表。段氏在该书中除了揭示许慎辨析同义词的方法外，还使用了一些创新性的方法，做了大量的同义词辨析工作，还注意到了同义词的时代差异，而且创造了“浑言（统言）”、“析言（别言）”理论，这一“理论是从词义本身的范围、运用中所指的范围的相互关系中作出的概括，是词义分析理论上的杰出成果，对后代词汇学的研究有很大启发”。^①可以说，段氏的研究代表了语文学时期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使今天研究古汉语同义词，很多思路、方法、理论也是来自段氏。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古汉语同义词仍使用训诂学方法，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树，另一方面整体上还缺乏“史”的观念。

（二）语言学时期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

语言学时期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有明确、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同义词的界定、同义词的确定方法、同义词的类型、同义词辨析方法、同义词的来源、同义词的时代及方言差别、同义词与同源词及反义词之间的关系等。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60余年，特别是近30余年。研究成果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通论性研究。这一类成果一般以古汉语词汇通论性著作的章或节的形式出现，有的则是单篇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赵克勤先生的《古汉语词汇问题》第二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何九盈与蒋绍愚先生的《古汉语词汇讲话》第七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蒋绍愚先生的《古汉语词汇纲要》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高守纲先生的《古代汉语词义通论》第三章第二节（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黄金贵先生的《论古汉语同义词的识同》（《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韩陈其先生的《论古代汉语同义词的源类辨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池昌海先生的《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杭州大学学报》

^①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P51-52；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17；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P321；刘成德《试论〈说文解字注〉对同义词的辨析》，兰州大学学报（哲社）1989年第1期。

1998年第2期)、《对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黄金贵先生的《论古汉语同义词构组的标准和对象》(《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张生汉先生的《关于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一点看法》(《语言研究》2005年第1期)、张守良先生的《古代汉语同义词的作用及其微殊管窥》(《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刘晓红先生的《如何判定中古汉语的同义组》(《汉语史学报》第二辑)等。这一类研究重在理论建设,对于人们从各个角度全面、深入地研究古汉语同义词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理论探讨不是建立在对古汉语断代、历代同义词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这些理论还显得单薄,有雷同化趋向。

2. 泛时研究。这类研究的特点是将古汉语作为一个整体,时或有史的眼光和史的描述、探讨,但总体看“史”的意识不明晰,而且不能将其贯彻到整个研究之中。这一类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凤阳先生的《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黄金贵先生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政白先生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黄山书社,1992年版)、洪成玉、张桂珍先生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燕文先生的《先秦四组动词同义词辨析》(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等。这类研究能够深入到材料中去,资料丰富,辨析细致,对人们阅读古书有很大帮助。存在的问题是时代性不强——或笼统地将古汉语作为取材、研究的对象,或将先秦汉语(有的包括两汉汉语)作为研究的对象。有的研究在同义词的界定、范围的确定等方面还缺乏明确的理论作指导。

3. 断代研究。这一类研究可以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为代表。该书中编《汉语词汇史》中有“上古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中古汉语同义词的发展”、“近代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三节。这类研究的长处是有明确的时代观念、发展观念,使用的是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缺乏断代、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致使这样的断代研究还只能是初步的、粗线条的,还无法做出全面、准确的总结。向先生书中先秦同义词研究因有作者的《诗经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底子,所以较之中古、近代的研究显得更为丰满。

4. 专书研究。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主要原因就是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太少,致使其他

类型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史断代与历代的研究底气不足。专书同义词研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古代语言学著作（或说“语文学”著作）为研究对象，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冯蒸先生的《说文同义词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宋永培先生的《〈说文〉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郭在贻先生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刘成德先生的《试论〈说文解字注〉对同义词的辨析》（《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王建莉先生的《〈尔雅〉同义词考论》（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王建莉先生的《〈尔雅〉训诂形式与同义词的判定》（《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等。这种专书式的研究，对象明确，有助于人们充分、准确地吸收传统同义词研究的成果。但这类专书毕竟不是以某具体时代语料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因而影响了以这类专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的价值。

另一种是研究某一时代某种语料的全部或部分同义词，主要成果有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研究》（第四章第六节《〈诗经〉里的同义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双棣先生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吕氏春秋》的同义词”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周日健、王小莘先生的《颜氏家训词汇研究》（“《〈颜氏家训〉同义词语研究》”部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毛远明先生的《左传词汇研究》（第四章“《左传》同义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管锡华先生的《〈史记〉单音词研究》下篇《〈史记〉单音同义词》（巴蜀书社，2000年版）、徐正考的《〈论衡〉“征兆”类同义词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黄晓冬先生的《〈荀子〉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唐智燕先生的《今文〈尚书〉动词同义词聚合》（《求索》2004年第6期）、沈林先生的《〈左传〉单音节实词同义词群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5月）、呼叙利先生的《〈魏书〉复音同义词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王彤伟先生的《〈三国志〉同义词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牟玉华、张小丽先生的《先秦法律用语同义现象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王冰《北朝汉语复音词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武振玉先生的《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魏德胜先生的《西北屯戍简牍中的“矢”“箭”》（《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而池昌海先生的《〈史记〉同义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徐正考的《〈论衡〉同义词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周文德先生的《〈孟子〉同义词研究》(巴蜀书社, 2002 年版)、赵学清先生的《〈韩非子〉同义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则是专门研究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专著,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仅见的 4 部已出版的研究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专著。池书对《史记》同义词的构成和来源、区别特征、修辞功能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 并探讨了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周书则对《孟子》单音节实词同义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较为科学的考释、论证, 并对《孟子》同义词的辨析、同义词显示的格式、同义关系形成原理等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讨, 其《〈孟子〉数据库》也一同问世, 对学术界也有不小的贡献。赵书对《韩非子》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同义词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虽然涉及的只是单音节同义词, 但描写细致, 同义词提取方法科学, 其同义关系格式的总结、辨析理论的探索及同义词形成原因和途径的探索更是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 这种针对某一时代某种语料的全部或部分同义词所进行的研究代表了当前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发展方向, 极具生命力; 其次还应该肯定, 这些成果, 其研究对象均为各个时代的典型语料, 作者对这些语料尽可能地做了穷尽研究, 并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比较, 大大有助于古汉语同义词的断代与历代研究。存在的问题是, 在一些诸如什么是同义词、同义词的范围、确定同义关系的标准等问题上还缺乏权威的理论作指导, 因而各人的研究在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当然, 这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另外, 各家在研究专书同义词时, 或只作特点、使用趋势等方面的考察, 而不展示专书同义词的细目, 或列出专书同义词的细目, 但不附加任何说明(如毛远明书); 或列出细目并略指其同异, 但不附例证与出处(如池昌海书)。这都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专书同义词的面貌。

除以上四种类型的研究外, 还有一种研究应该提及, 那就是从发展角度研究同义词, 有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范本。一本是汪维辉先生的《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该书研究了 41 组常用词(实际上也是同义词组)从东汉到隋的演变情况。另一本是管锡华先生的《〈史记〉单音词研究》, 该书下篇《〈史记〉单音同义词》对《史记》中的 21 组单音同义词进行了考察, 并对每组同义词的首见、本义、同义的形成、发展变化、地位消长等作了探讨。这是一种历时研究, 而且是在考察了各代大量典型语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 虽然研究范围小、时间跨

度短,但这代表了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如王彤伟先生的《“首”、“头”的历时演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4辑)、《常用词“疾”、“病”的历时替代》(《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于飞的《论两汉时期的常用词“皮”、“肤”的历时替换》(《长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两汉常用词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等等。只是这种研究要取得较大的成就,也还有待于各代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

通过对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我们认为,在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上,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是目前和未来要努力去做:

第一,应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研究,这是做好古汉语同义词断代研究与历代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在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颇具规模之时,才可从事断代与历代的全面研究。目前,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先就某组或某几组同义词进行断代和历史的全面研究。

第三,在研究专书同义词或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进行理论探讨,使理论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研究——实际的研究与理论建设应同步进行,相互推进。^①

二、同义词的界定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同义词,自然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同义词。但要将这个在相关教科书和论文、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术语界定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如果从事的是纯理论探讨,那只需要在理论上使自己的界定能够自圆其说,然后举一组或几组典型的例证即可。如果进行的是专书同义词的研究,那就不仅仅要使自己的界定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还要能够便于操作。

学者们对同义词所作的界定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能普遍地为大家接受的界定。现有的界定虽然五花八门,侧重点各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四种:一是“意义同近说”,如周祖谟先生认为:“凡声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一般称为同义词。”^②二是“概念同一说”,如石安

^① 徐正考《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述评》,《北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周祖谟《语言学常识》,《语文学习》1958年第9期。